

东吴学术文库

蒋国保 周可真 主编

儒佛交涉论

江苏省重点学科「中国哲学」学科建设项目
苏州大学「12工程」学科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韩焕忠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东吴学术文库”总序

“东吴学术文库”丛书前两批七部书稿《儒释合论》、《圆教的危机与谱系的再生——宋代天台宗山家山外之争研究》、《先秦儒家性情论》、《方以智与明清哲学》、《顾炎武与中国文化》、《耶释合论》、《维摩诘经思想新论》已分别于 2007 年、2009 年出版,现在出版的三部,是该丛书的第三批。该丛书首批、第二批七部书稿付梓时,作为组织和操持这套丛书之写作与出版的主编,我曾为该丛书撰写了“总序”,以说明出版“东吴学术文库”的缘故。现将之照旧移在下面,以示该丛书的连贯性,亦兆本学科在学术上的发展。

学术这个词,通常是用以称谓系统的、专门的学问。我们以“东吴学术文库”统括自己的学术专著,不外乎三点考虑:首先,希望借之以展示苏州大学中国哲学学科整体的学术研究能力与水平。苏州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建立较晚,其历史,严格地讲不足十年,但在短短几年内,学科建设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突出的标志,就是从 2000 年至今的几年内,学科建设实现了三次跨越,即 2000 年申报硕士点成功,2003 年申报博士点成功,2005 年申报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成功。现在我们学科共有 10 人,其中教授、博士生导师 4 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 人,讲师 4 人,在年龄结构上,在学术梯队上,在学术水平的层次上,都比较合理,是一个有着良好基础的学术队伍。这个学术队伍总体上讲还比较年轻,但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一是团队成员之间和谐相处,交往风气正,团队成员之间的交



往建立在工作上,建立在学术事业上,建立在同志间真诚的关心上,而不是建立在吃喝玩乐上;二是学术研究的风气正,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团队成员还比较清醒,基本上能保持以平常的心态从事教学与研究,至今尚未出现为博个人虚名而不惜牺牲团队名声的事,更没有出现任何有损教师声誉的事。我们认为,要护卫团队的声誉,在当前尤其要重视学风建设。为了树立良好的学风,我们除了要求团队成员自觉遵守教育部和我校制定的科研、教学等学术道德规范,还提倡团队成员培养和护卫本学科独特的学风。为此,我们制定了“学风四字歌”,以方便团队成员自勉。“学风四字歌”是:“诚实做人,人格高洁;言行一致,表里相协;戒浮戒躁,勤奋治学;谦虚谨慎,潜心修业;文风朴实,行文精确;理论坚实、知识广阅;古今贯通,中外同悦;史论结合,创新超越。”我们深知,以此自律,我们做得还不够,但“虽不能及,心向往之”,照之不懈努力,是我们不变的志向。

其次,希望借之以表明苏州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学术追求与学术理想。东吴这个专用名词,原先用以称谓三国时的吴国,但从杜甫的诗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来看,最迟在唐代它就用来泛指吴地。吴地的地域当然要比现今苏州所统辖的地域广泛得多,但现今苏州行政区划下的地域,历来都是吴地的中心和主要地域,所以无论是出生于昆山的顾炎武还是出生于吴县的惠栋,都不无自豪地称自己是东吴人。我们团队的十位同志,就籍贯上讲,都不属于东吴人,但就我们现今工作在苏州大学来说,我们以“东吴”这个词来标示自己学术研究的地域性,也合情合理,并非牵强附会。但我们心中清楚,我们以东吴一词来显示自己学术研究的特色,并不是为了将自己的学术研究限定在吴地的地域文化研究上,而是为了表示我们的学术研究有传承和发扬吴地学术传统的历史使命。吴地的学术传统,正如章学诚所评断的“重博雅”,但如同顾炎武、惠栋学术研究取向所集中体现的,这个传统在明末以后,并非一



线展开,而是既开出顾氏的“经学即理学”的“实学”路向,也开出惠氏的“笃于尊信”的“朴学”的路向。如何在现代的文化背景下,以惠氏似“朴学”的工夫做顾氏性的“实学”(经世之学)研究,应是我们今天传承和发扬吴地学术传统的努力方向。其具体设想是:以明清哲学为主攻方向,形成以明清哲学为体,明清儒学与宋明佛学为两翼的研究格局,同时积极引进和培养道家、道教研究专门人才,在将来形成明清儒学、宋明佛学、明清道教三者鼎立的研究格局。在明清哲学研究方面,侧重展开对明清之际哲学思潮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将是多视角、多侧面的,它不仅涉及纯哲学领域,而且更多地涉及文化哲学领域。具体地讲,将尤其关注以下专题:①明末清初时代精神及其表现;②明末清初之主要的学术派别;③明末清初大家(主要指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傅山、孙奇逢、李颀、李贽、颜元)个案研究;④明末清初四大家(顾、黄、王、方)比较研究;⑤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之争及其启示;⑥明末清初哲学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影响;⑦明末清初士大夫人格研究。在地域学术文化思想研究方面,注重研究东吴经学、东吴佛学、东吴考据学,并通过对东吴学派与浙东学派的比较研究,以凸显东吴学派的学术传统,从而寻找现今发扬该学术传统的切入点,为创立“新东吴学派”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相信,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新东吴学派”一定能够创立,并做出它无愧于时代的学术贡献!

再次,希望借之为本学科老师,尤其是年轻老师出版学术研究成果提供园地。我们学科年轻教师较多,他们能否尽快成为某研究方向上的专家,将直接影响本学科今后能否长足的发展。如何为他们从事学术研究和发表学术成果创造必要的条件,使他们得以比较顺利地成长为专家,一直是我们学科建设考虑的重心。我们认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事业,需要多方面不懈地努力去推动。但就我们自身而言,目前迫切要做的工作,就是要以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队伍建设,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将本学科建设成为一个年龄结构合理、

学术观念新、学术风气正、研究能力强、工作作风勤的学术梯队。考虑到国内学术界新一轮的学术竞争的主角已不是中老年学者,而是年轻学者这一现实,本学科的学科建设,打算在充分发挥老教师作用的同时,切实加强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与提高,使他们在不太长的时间(5年)内,在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上达到较高造诣。我们为此制定了一个具体的检验标准,即在国内中国哲学同行中,其是否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求本学科所有的年轻教师,牢固树立专业意识,一定要在学术上明确确立自己的主要专业,将自己的深造和提高与自己所确立的主要专业紧密结合起来,切不可为利益计而随意变动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具体设想是:在经费上重点支持45岁以下年轻教师,对已晋升为副教授的年轻教师,为其创造条件,使他们在学术上尽快提高,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成长为某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对尚未晋升为副教授的年轻教师,关心他们的学习、工作、生活,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工作、生活上的困难,使他们有条件在学术上尽快提高,在短期内成为有专业特长的副教授。我们坚信,只要我们积极为年轻教师创造学术研究条件,就一定能调动他们学术研究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从而促进他们在学术上健康发展,最终成为著名专家。

东吴学术重博雅,薪火传承靠大家,继往开来吾有责,何必搪塞话桑麻。这是我衷心的期盼与希望,愿与同志们共勉!

蒋国保

2012年2月25日

自序

我所在的苏州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学科，是江苏省重点学科。带头人蒋国保教授非常关心青年教师的学术研究，特嘱我将历年来的论文整理成册。领命之日，我虽心怀感激，但也有些惶恐，自知学殖荒浅，似乏出版论文集之资质，几经力辞，未获允准，也就只好勉为其难，遂成就了这本小册子面世的机缘。

多年来，我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儒学与佛教的关系上。在我看来，佛教东传中土，无论是对佛教，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都堪称是一“大事因缘”。就佛教而言，东传中土不仅使自身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获得了一个汲取儒、道、藏、蒙等文化滋养，实现自身形态转化和提升的大好机遇，并以汉传和藏传的形式影响了亚洲的许多国家，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如果不是因传入中国，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恐怕早就在印度教的兴起和伊斯兰教的东进之中消亡了。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佛教的输入等于在诸子百家等固有的思想文化资源之外，又为国人开辟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精神世界，国人不唯可以在这一精神世界中栖息性灵，还可以将这种外来的宗教文化作为参照体系，以便更好地理解固有的传统。中唐之后，思孟之学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得益于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盛行，而

自序



入宋以后理学的兴起则更是儒家精英从佛教思想中汲取资养的一种结果。因此我认为,儒佛二家的相互交涉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乃至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大事之一,学者们无论花多大的气力去深入地研究都是不过分的。

我很喜欢用“交涉”一词来描述儒佛之间的相互关系。此词在这里虽然也含有平时人们所常说的“交往、牵涉”之意,但主要还是有取于华严宗的“交光相网、涉入重重”之义。佛教之东传汉土,是涉入儒家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语境之中,佛教在这一语境中汲取儒家的思想资养,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逐步实现了自身形态的中国化,形成了天台、华严、禅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与儒道二家鼎足而三,这实际上也是儒家思想因素向佛教思想体系的涉入。天台、华严、禅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挟其思想融合及宗教慰藉之优势,梵响三唱,高遏行云,使儒家相形见绌,光彩尽失。儒家代表人物痛定思痛,深入佛老,反之六经,在佛教心性论盛行的社会语境中高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努力挖掘自家思想中的心性论内涵,使自家的经典体系由五经为主变而为尊崇四书,这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佛教的思维方式涉入了儒家的思想内核,儒家的思想优势失而复得。儒家既重执思想界之牛耳,佛教在其故乡印度也逐渐消亡,中国佛教的发展无法获得外来文化因素的滋养,转而向儒家靠拢,承认儒家在治理国家和安定社会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接受了儒家关于自家的非主流地位和次要作用的文化定位,实现了又一番的向儒家主流话语的涉入。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儒佛二家在欧风美雨的飘摇之中,同样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其唇齿相依的关系愈加明显,二家代表人物在最大程度上摆脱门户之见,相互吸收,相互扶持,从而使儒佛二家的思想因素在西学语境中实现了更深层次上的相互交涉。

这些文字就是我思索儒佛交涉关系的真实记录,都已在相关刊物上公开发表,这次收入本文,基本上保留了投稿之前的样子。俗话说,“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若能引起时贤及来哲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也就不枉此一番灾及梨枣了。而我亦将继续关注儒佛二家的相互交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拿出更有分量的成果与诸位分享。

韩焕忠

2011年11月22日序于虚室。

自
序



总 论

三教合一新论

儒、道、佛三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其中“儒”是指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儒家是不是宗教,学术界有争论,我们不遑深论,不过历来说儒教者多重在儒家的教化方面,此处亦然;“道”既指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也包括正一、全真等土生土长的道教;“佛”是指从印度传入中国后本土化了的佛教。古代“教化”之“教”与“宗教”之“教”尚无明确的区分,故而习惯上也将三家笼统地称为“三教”。“三教合一”是有关中国文化基本结构的古老命题,这一命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思想内涵。那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对此应该怎样理解呢?

总

论



一、三教各合其一

从三教各自的发展历史角度上说,“三教合一”就是儒、道、佛三家各自站在本家或本派的立场上,汲取、消化、吸收其他两家的成分,在保留自身基本特征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其他两家的某些要素或特征。

佛教对儒道因素的融合和吸收促成了自身形态的本土化。佛教产生于印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人们先是将佛教视为神仙道术的一种,因此将佛与老子并祠。继而借助老庄玄学的盛行,佛教以“格义”的方式,即用老庄玄学等中国固有的词汇

和概念解释佛教独特的思想,终于使佛教的丰富义理在汉语环境中获得了理解,在东晋时期形成了研究佛教般若学的一个高潮。而儒家对人性善恶的关注及“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主张对佛教的影响则更为重大和深远,不仅使风行一时的“性空般若学”迅速转向“涅槃佛性论”,而且还使中国文化“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思维渗透到佛教义理之中,至隋唐时期,最终形成了天台、华严、禅等圆融大乘与小乘、空宗与有宗、内学与外道、出家与居俗的中国佛教诸宗派,完成了自身形态的本土化。也就是说,中国佛教是以佛教为主体,融合儒道二家的结晶。这种融合,既反映了中国文化转化外来文化的心胸和智慧,也充分体现了佛教在异质文化环境中具有积极、主动的灵活适应能力。

道家和道教对儒佛因素的吸收和利用促成了自身形态的发展演变。道家在先秦“百家争鸣”中是儒家的对立面,入汉之后虽然也一度受到重视,但一直处于民间状态,未曾著为国家的功令。魏晋之时,天下动荡,玄学兴起,儒家《周易》与《老子》、《庄子》并列为“三玄”,注释《论语》与《周易》成为一时之显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魏晋玄学就是以道家为主体、融合儒家因素、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而发展出来的一种新道家。土生土长的道教,在经历了汉晋起义的失败后,逐渐融入儒家的忠君孝亲观念,与世俗政权取得了协调;在宗教形式上,无论是经文的撰写,经典的组织,还是日常的修为,宫观的组织,都尽力模仿佛教,使自身的宗教形态和功能日渐完善,以至于在唐朝上升为国教。宋金时期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主张性命双修,三教平等,兼容儒释道,以《老子》、《孝经》、《心经》为化世导俗的基本经典,具有强烈的以道为主而融合儒释的思想倾向,因而在金元时期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佛道二家的影响是儒学由着重外在规范的汉唐经学转变为重视心性义理的宋明理学的关键。儒学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为显学,入汉之后,逐渐被尊为官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



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上而国家政令,下而风俗教化,内而家庭伦常,莫不以之为据,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社会作用。但自东汉末年以降,由于社会长期动荡和佛道二教的发展,儒学日渐衰微,其凝聚人心、化导世俗的能力较之佛道二教远为逊色。这种状况即便到了隋唐时期的大一统之世也没有根本的改变。佛道二教的兴盛给儒家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等以很大的刺激,他们祭起“复古”的大旗,仿照佛道二家的“法统”,排列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大力表彰《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由此开启了儒家重视心性义理的形上建构,理学于焉兴起。宋明理学家们所揭示的“太极”、“天理”、“本心”、“良知”等最高范畴,所提出的“存理灭欲”等主张,所开出的“主敬”、“静坐”、“发明本心”、“致良知”等修养功夫,包括他们疏解经典的方式,莫不晃动着佛道二教的影子,儒家也由此重执思想界的牛耳,再度成为主导世道人心的精神力量。

儒、道、佛三家的相互吸收和汲取,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不仅使自家走出了困境,而且最终促成了自身形态的发展变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了贡献。

二、三教合而为一

从三教共同构建中国文化的意义上讲,“三教合一”是指儒、道、佛三家经过长期的磨合,建立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补充、并立共存的关系,形成了各家的文化特色和功能定位,共同支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厦,构建了中华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在这座清新自然的精神花园中栖息的人们,进退从容,出入自在,涵养了一种刚健、博雅、圆润而又空灵、通达的君子风范。儒家主张内圣外王,修己治人,重视人文教化,积极推行仁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通过行为主体的推己及人,实现天下大同,对人性完善和社会秩序表现出充分的信心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以儒治世”实际上就是人们对儒家持有的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赞赏。道家重视自然,认为大道无为,自然而然,主张“安时而处顺”,不以外在的功名利禄和内在的喜怒哀乐伤害自己纯真无瑕的本性,通过“抱柔守雌”、“怀素抱朴”等方式“复归于婴儿”,从而能够“长生久视”,“尽其所受乎天”。“以道治身”也就意味着人们对道家关注心理感受和身心健康的肯定。而佛教看到了人生和社会是一个充满烦恼、苦难深重的过程和集合,这些烦恼和苦难的最终根源来自人们内心的贪婪、嗔恨和无知。因此,如何化解人们心中的各种“结使”,使人们从各种“束缚”中解脱出来,就成为佛教关注的重心。“以佛治心”则表明了人们对佛教在心灵净化和品位提升中的巨大作用的一种期许。那些长久沐浴在中国传统文化恩泽中的人们,“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在道德、功业和学问各方面都涌现了一批足以仪型千古的典范,表明儒、道、佛各以自家的擅长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心灵翱翔的精神空间。

人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有关关注的重心。民间有“三十学儒”的说法,意谓年轻人一方面应该积极进取,认真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提高自己为国家、社会和人民服务的本领,也就是通过“格物”、“致知”、“诚心”、“正意”而实现“修身”,使自己趋向“内圣”的境界;另一方面则应认真干好本职工作,处理好人际关系,此即实践“亲民”,恪行“忠恕”,努力“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外王”以“兼济天下苍生”的宏伟抱负。而“四十学道”的古训则告诉我们,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惨淡经营,人们在丰富人生阅历的同时也经受了岁月的磨炼,久经世事风霜,饱受人情冷暖,无论是功成名就,还是云路未展,都已是人到中年,身体的各项指标开始大不如前。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们应该较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心健康,不仅要注意适当节制欲望,控制情绪,保持内心的平静和舒畅,还要注意劳逸结合,加强锻炼。在道家看来,就是要“顺应自然”,适时“养生”。流年



易逝,人生易老,“烈士暮年”,虽仍可“壮心不已”,但血气既衰,若“老马恋栈”,或继续“贪多务得”,必然导致“心力交瘁”,稍有不慎,甚而会英名扫地。因此人到晚年,更多的应是主动撤出是非之地,看透功利,看破红尘,放下一切,安享余年。佛教的般若之智这时候就极为必要,所以古人云“五十学佛”。“三十学儒,四十学道,五十学佛”作为一句古来相传的格言警句,意味着儒、道、佛三家在中国人的一生中各自找到了发挥重大作用的阶段,从而使中国人的人生境界趋向于理想、圆满和完美。

我们不否认历史上三家都有一些学者站在自家立场上对其他两家进行攻讦和非难,不过这种非难的结果往往是导致三家思想因素在更高的层面上“各合其一”和“合而为一”。从一定程度上讲,相互的区分和对立成为三家深入对话、交流和融合的前提。由于儒道佛三家在社会生活中已经形成了各自的胜场,在人生历程中具有了各自发挥殊胜作用的阶段,而不少的文人士子又往往出入三家,兼收并蓄,时取其长,为我所用,我们可以站在社会生活整体性和人生历程统一性上说,儒道佛名义上虽然分为三家,但对于那些三家共尊而并修的学者而言,似乎就是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今天的人们可将这个体系概括为“中国传统文化”。

三、三教融合于一

就传统文化的当代弘扬和发展而言,“三教合一”是指儒、道、佛三家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积存和现实的精神力量,共同融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合力服务于社会的全面和谐与人类的科学发展。三教在这一层面上的合一具有两方面的含义:

其一,由儒、道、佛三教合一而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实现自身形态中国化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无论具有多么大的真理性,都无法想象可以在文化沙漠中生根发芽。而其之所以能在中华大地上开

出绚烂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具备消化、吸收和转化这一人类文明成果的智慧和能力。如,儒、道、佛三家都非常重视切实的践履和修行,这使得中国人极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关注;儒、道、佛三家哲学思想中都具有丰富的辩证法因素,为中国人准确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文化基础,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从来未被视为是对外来思想的阐释;儒家仁人志士以“济苍生,安黎元”为职志,中国佛教高僧大德也以“慈悲普度”为怀,而共产主义对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做出了承诺,故而能够深入人心。即便到了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执政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源泉,如“实现小康”、“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理念的提出,就具有明显的传统色彩。因此我们说,以儒、道、佛三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运动着上了“中国特色”,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因之具有了融合中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并将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的意味。

其二,儒、道、佛三家也都在努力协调好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积极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儒、道、佛三家不仅是历史的文化遗存,还是现实的精神力量;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还拥有着为数众多的信众。俗话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由于在家庭出身、人生经历、社会交往、个人际遇等因素上的千差万别,必然导致各不相同的兴趣、爱好和追求,儒、道、佛三家丰富的文化积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多彩的文化样式恰好可以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精神需求,为人们的心灵净化、境界提升、意义安顿以及人际交往提供支持,从而形成充实的精神状态、健全的人格特征、卓越的文化修养和融洽的人际关系。儒、道、佛三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存在和发展,为人们多样性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这无疑将更有利于构建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融合为一,使儒、道、佛三家获得了

走出传统、走向世界、实现自身形态现代化的大好机遇。由于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范围也越来越广泛,这就为今天的儒、道、佛三家与世界上各个伟大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和背景,儒、道、佛三家可以就有关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如人口膨胀、环境污染、和平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世界共同伦理构建等,发表自家的观点,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启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儒、道、佛三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融合为一,将极大地提升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并最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

(原刊于《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总

论



目 录

“东吴学术文库”总序	001
自 序	001
总论 三教合一新论	001
佛教中国化	001
佛教中国化的形式和内容	003
儒道思想与大乘佛教的弘传	009
佛教对中土孝亲观念的因应之道	016
中国佛教伦理的拟血亲化取向	033
与时俱进与契理契机	040
高僧论儒	047
天台智者的儒道观	049
清凉澄观的三教之辨	056
圭峰宗密的本末之辨	061
明教契嵩与儒家四书	069
援佛入儒	085
佛性论与儒家人性论比较	087
佛性论与程朱人性论重建	096
禅宗佛性论与陆王心性论重建	107

目 录



儒学与佛教的近代发展	115
尊孔与抑孟	117
民国佛教的义学创新	131
中国佛教的当代抉择	139
印顺法师的大学纲目论	147
现代新儒家的佛学观	161
马一浮的佛学观	163
马一浮对《论语》的佛学解读	174
马一浮对《孝经》的佛学解读	185
马一浮的易佛融通论	195
梁漱溟的佛学因缘	207
熊十力的佛学观	215
唐君毅与牟宗三的佛学观比较	229
佛教的思想贡献	239
中国佛教圆融观及其现代价值	241
全球化与华严宗的法界观	251
十不二门的生态意蕴	257
不即不离 会通融合	
——方立天先生论佛教与中国哲学的关系	263
结 语	
——作为公共话语的儒家思想	270